

1411

革命历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万安委员会编

萬安文史資料

第十六輯

(内部資料)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萬安縣委員會編

二 000 年 十 月

万安县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编 审：黄明祈
主 编：耿艳鹏
编 辑：袁存塔 谢恒来
郭金锋 张应兵
印 刷：万安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目 录

- 1、帮助毛泽东了解城市商业的人
——记寻乌县商会会长郭友梅 王阿寿 (1)
- 2、珍贵的革命文物——《江西苏维埃
政府训令》 蔡建萍 (15)
- 3、许拔芳的传奇一生 梁莉莉 (18)
- 4、曾洪易其人 陈立明 (26)
- 5、曾洪易编《党的建设》 王阿寿 (56)
- 6、关于曾洪易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
..... 王阿寿 (62)
- 7、梁书曾去马家洲集中营探望廖承志
..... 郭敬华 (66)
- 8、刘振群与“既往不咎”
..... 叶世昌、邹慧章 (69)
- 9、忆万安青年学生寒假抗日宣传队
..... 刘盛瑞 (72)
- 10、三百年前荷兰商使话说吉安 ... 陈阜东 (76)
- 11、万安韶山 耿艳鹏 (82)
- 12、南宋万安抗元勇士刘庆元
..... 郭敬华、肖忠民 (86)
- 13、国宝贵铜俑方形狮状温酒器 ... 蔡建萍 (90)
- 14、石壁下石刻和降妖的传说 许诗蕊 (92)

帮助毛泽东了解城市商业的人

——记寻乌县商会会长郭友梅

·王阿寿·

毛泽东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走上领导岗位，尤其 1927 年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和发展红色苏维埃区域以来，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以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区分敌我友，更好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先后在湘赣边的永新、宁冈，赣西南的兴国、吉水、吉安等地搞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对他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不少县城乃至中小城市的攻克和占领，如何认识城市商业资本，如何对待工商业者，就成了革命的新问题。一些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总认为工商业者是剥削者，应在没收财产、予以打倒之列。毛泽东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1928 年 1 月，他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就认识到保

护工商业者，尤其中小商人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红色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苏区人民的生活。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却一直认为应打击工商业者，没收他们的财产，有的甚至还干出了烧毁其店铺的行为，如湘南暴动和湘赣边有的县乡就如此干的。这涉及到党的政策问题，毛泽东总想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摸清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56页）。

毛泽东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完红四军前委

和红五、红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联席会议(赣南特委代表因故未赶到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之后，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运动，5月1日，到达赣南临近广东福建边境的寻乌县城，驻扎在马蹄岗一带(毛泽东住此地的天主教堂内)，受到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等同志的热烈欢迎。由于当时战局相对稳定，毛泽东决定部队在寻乌小住一段时间，一方面作些休整、补充，一方面也可作些调查研究。他得知寻乌县城在当时周边地区还算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城，商业也比较发达，赣粤闽边境贸易也比较活跃，很想就在此地对城市商业诸多情况作番调查。他把意图告诉古柏，古柏很支持。毛泽东就乘兴开列了长长一溜的调查提纲，并要古柏找几个各方面都很了解情况的人，其中一定要几个真懂商业的人来开个座谈会。古柏是本地人，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还不容易？根据毛泽东调研会的要求，他很快就陆续找来了十一个“寻乌通”，他们中有乡苏维埃主席、县苏维埃委员、童生、秀才、职员、教师、工友、农民、商家。后来，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

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第 42 页）毛泽东对参加会议并积极、坦诚提供城市商业情况的怡和号杂货店老板郭友梅特别满意。

郭友梅，江西万安县人，12 岁就离家去寻乌随叔父学徒。那时，他叔父的杂货布匹已在寻乌经营了六十多年，是远近知名的商家了。后来，郭友梅接过生意，当了老板，苦心经营，“怡和号”在两叔侄手中合起来也是百年老店了。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1900 年）是鼎盛时期，有底本三千元。由于是老店，一贯信誉度高，在粤闽和赣州赊借货物也容易，一年间生意额做到二万元上下，成为寻乌县城第一家大商店。郭友梅由此先后两次做过寻乌县商会会长。这些情况是座谈会之前，古柏向毛泽东介绍的。毛泽东因此对郭友梅很感兴趣，向古柏说一定要去见见这位商贸里手郭友梅。“怡和号现在大不如从前了！”古柏告诉毛泽东。

那天，古柏带着毛泽东来到寻乌县城南门街，老远就看到了“怡和”的招牌。到了杂货店门前，毛泽东看到店里货柜上摆着一些布匹、日用杂品等货物，还有一些当时时髦的瓷桌灯、洋蜡烛、洋纱巾、骨筷之类“洋”货。买东西的人不多，店铺显得冷清。古柏指着柜台边的一个老者说：“那就是郭友梅”。

郭友梅与古柏同住一个县城，早就是熟人，听他介绍身边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的毛委员，肃然起敬：“久仰，久仰！”并让进店里坐下。郭友梅因被军阀敲诈过，也见过军队抢商店，对当兵吃差的人没有好感。前几天听说工农红军打进了县城，还着实慌张了一阵子，怕有什么不测，或者又要“募捐”、送款，但见进城的红军和蔼可亲，买东西付现钱，买卖公平，而且许多本地人，如古柏，和红军那么亲热，才放下心来，照常做生意。现在毛委员还来到店里做客，郭友梅怎么不高兴呢？

郭友梅给毛委员斟了茶，见毛委员问话，答道：“今年 59 岁，快满花甲了。”毛泽东喝着茶，随和地与郭友梅提起了家常，从他老家

万安，问到来寻乌几十年的情况，问得最仔细的就是从哪进货，什么货好销，赚钱与亏本的生意经。

“做生意要了解货源和行情，进货快，销得快，就有赚头。进货不对路，或误了时机，积压货多了，卖不动，一定会亏。做生意，赚钱的时候有，亏本的时候也有，生意饭难吃啊。”郭友梅感慨地说。

郭友梅还告诉毛泽东，做生意信誉的重要性：“做生意当然要本钱，但像我们这样的店号自身本钱不可能多，完全是靠讲信誉，在进货时，出一部分现洋，另一部分，有时还是大部分货物就靠赊帐了，本地人叫‘缴’。谁能缴得到货，谁就可能是赢家，一般来说是付一百元现金应缴三百元的货，有时我们一次能缴四五千元的货。我们也缴给乡下小商号货，这样生意就做得活了。”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哎，现在不行了。”听得郭友梅叹了口气：“现在兵荒马乱的，缴不动了”。

毛泽东听古柏介绍过怡和号的衰落，还与几次遭劫有关。毛泽东颇为同情地询问。

郭友梅捂着胸口，连连摇头，不愿重提伤心事。见毛泽东是诚心相问，还是将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了出来。末了，郭友梅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革命军光复，我们商家也拥护啊。光复派号召四乡农民进城造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各家商店，几千人呀。不多久，北洋军反扑回来，又在城里大肆抢劫，暗无天日”。见到郭友梅心情颤抖的样子，毛泽东和古柏安慰了几句。郭友梅望着毛泽东和古柏，从内心说出一句话来：“动乱和军阀我见得多了，还是你们工农红军好！”

古柏告之郭友梅：“毛委员想在寻乌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他特别想知道你们商家的具体情况，你是寻乌通，又是生意通，想邀请你参加，不知老先生有无时间？”

“荣幸，荣幸。”郭友梅听罢此言，站了起来，双手作拱，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是我们的知心人，你这样平等待我们，又那么谦虚好问，我们很感动。什么时候开会，叫我一声，我一定参加。”

毛泽东很高兴地握住了郭友梅的手。在

寻乌，毛泽东交上了这个做生意的朋友。人心换人心，郭友梅也信得过毛泽东，支持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事业，积极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而且有问必答，话越说越多，心情也越高兴。郭友梅成了参加毛泽东寻乌调查座谈活动(前后十多天)最多的人之一。对此，毛泽东在著名的《寻乌调查》中有历史记载——。

“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

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尚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

“杂货。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眉、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

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虽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的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杂货店

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他斟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长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象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长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

当时毛泽东在调查时，还注意到一种行业帮会性质的社会现象。这种行业帮会性质的组织，大概原先的宗旨是行内互帮互助，以壮大势力图自保谋发展。如寻乌一带就有个“同善社”的会道门组织，是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清末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并逐渐发展到全国许多地方。同善社内道级分十六层，前三层为一般道徒，四层称“天

恩”，五层叫“证恩”，九层为“十地”。四层以上均为道首。郭友梅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随同其他老板，加入了“同善社”。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注：即公元 1901—1902 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

“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同善社“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

看，毛泽东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状况，多么认真细致啊！

1930 年 6 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入闽作战。郭友梅望着远去的毛泽东，心里不免有些惆怅。好在共产党

还在，寻乌县苏维埃政府还在，而且经毛泽东主持下，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发展苏区商贸经济，怡和号杂货店经营又有了起色。寻乌原属中央苏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辖内，1933年8月，中央苏区新设立粤赣省，辖寻乌等七县，郭友梅的怡和号照常做生意。1934年秋，工农红军长征，苏区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派来了，郭友梅因多少与共产党有过来往，吃了一点苦头。但当时偌大的一个寻乌县城，共产党占领几年，工农商学各行各业，谁没有跟共产党有过交往？何况是生意人，所以郭友梅只不过出了一点钱，当局也就将他算了。怡和杂货店照常开门营业，但白色恐怖下的生意更难做了，郭友梅一家只好惨淡经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事，战火不但燃烧到了华北等地区，中国的沿海各地也时遭日机轰炸。1938年4月11日，日本海军侵占福建厦门。同年10月21日，国民党放弃了广州，25日又弃守中原重镇武汉。尤其寻乌周边的福建、广东，形势越来越吃紧，日本鬼子若打了过来，